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世界历史

WORLD HISTORY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第 9 册

古代国家的起源 和早期发展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Early States



江西人民出版社

世界历史

WORLD HISTORY

第9册

古代国家的起源 和早期发展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Early States

徐建新等/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代国家的起源和早期发展/徐建新等著.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2012.4

(世界历史)

ISBN 978 - 7 - 210 - 05187 - 9

I. ①古... II. ①徐... III. ①世界史:古代史
IV. ①K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29367 号

古代国家的起源和早期发展

徐建新 等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2年4月第1版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

开本: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15.5

字数:420千字 印数:1—4200册

ISBN 978 - 7 - 210 - 05187 - 9 定价:49.00元

赣版权登字—01—2012—37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江西人民出版社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三经路47号附1号
邮政编码:330006 总编室电话:0791-86898825 发行部电话:0791-86898893

网址:www.jxp-ph.com

E-mail:jxp-ph@tom.com web@jxp-ph.com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世界历史》学术顾问

齐世荣 刘家和 庞卓恒 何芳川

《世界历史》总编委会

主 任 武寅

副 主 任 于沛 吴恩远 周荣耀

成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吴必康 汤重南 李春放 张顺洪 张晓华

易建平 赵文洪 俞金尧 徐建新 郭 方

学术秘书 张晓华 (兼)

《世界历史》各卷负责人

《理论与方法》卷 / 于 沛

《经济发展》卷 / 吴必康

《政治制度》卷 / 徐建新

《民族与宗教》卷 / 郭 方 俞金尧

《战争与和平》卷 / 汤重南 易建平

《国际关系》卷 / 李春放

《思想文化》卷 / 赵文洪

《中国与世界》卷 / 吴恩远 张顺洪

《世界历史》编辑出版工作委员会

主 任 钟健华

副 主 任 周 文

委 员 朱法元 邓光东 周榕芳 林学勤

徐建国 彭新元 游道勤 朱卫东

书籍设计 揭同元

目录

前言	1
第1章 古代西亚地区国家的起源和早期 发展	1
第一节/古代西亚地区国家的起源	1
第二节/最早的国家形式——苏美尔城邦	13
第三节/阿卡德专制王国的形成	28
第四节/乌尔第三王朝专制统治的特点	40
第五节/古巴比伦时期中央集权国家的确立和 发展	52
第2章 古代埃及早期国家的形成	70
第一节/前王朝文化的演进与文明的形成	72
第二节/埃及早期国家的起源	78
第三节/埃及城市与城市国家的形成	84
第四节/城市国家向统一王国的发展	94
第五节/埃及古王国——专制主义统一王国的 确立	113

第 1 章

古代西亚地区国家的起源和早期发展

第一节

古代西亚地区国家的起源

西亚地区包括今天的土耳其、叙利亚、伊朗、伊拉克、巴勒斯坦、以色列以及巴林、阿联酋等海湾地区国家,在这样一个辽阔的区域里,世界最早的人类文明起源、传播、发展,世界最早的早期国家也是在这个地区的西南部,即两河流域地区起源的。

两河流域,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又称美索不达米亚,在希腊文中的含义为“河间之地”。因为这个地区的形状似一弯新月,是西亚地区少有的土壤肥沃、农业生产适宜的地带,因此又称“沃月地带”,或“肥沃的新月”。

幼发拉底河,长约 2 700 公里,流域面积约 444 000 平方公里,是西亚地区最大、最长的河流。西亚地区第二大河流底格里斯河发源于亚美尼亚高原,总长约 1 840

公里。两河流域气候不似今天这样干燥,气候属大陆性亚热带半干旱类型,北部和东北部山区为地中海型气候,只有冬、夏两季。

两河流经地区地形皆起伏较大,上游主要是山脉和高原,中游以丘陵和草原为主,下游为冲积平原,在波斯湾入海前形成大片沼泽。两河流域地区东部和东北部是伊朗高原和扎格罗斯山脉,西北部是托罗斯山脉,西部经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与地中海相连,南部为叙利亚沙漠和阿拉伯沙漠,东南部为波斯湾。这样的地形地势决定了两河流域地区的生产生活方式,在中上游,农业生产以畜牧业和天然农业为主;在下游地区,农业生产主要依靠人工灌溉,园艺业和渔业是重要的辅助生产部门。此外,幼发拉底河河水平缓,不利于大型船只航行,但小型船只可以通行,特别是古代两河流域人用芦苇和沥青制造的平底船至今仍是幼发拉底河航运的主要工具。

一、史前时代的西亚地区

在西亚地区,人类最早居住的遗址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这个时期,人类在一个地点停留时间极短,并且几乎没有重复使用的痕迹,主要居住在山洞和地穴里。到新石器时代,随着农业的产生,相对稳定的居址出现。约公元前7000年在安那托利亚高原南部的查塔·休於遗址,就已经出现了人类最早定居的迹象,考古发现了房屋遗址。此外,在两河流域上游地区也发现了人类早期居住的遗址。约公元前5000年,在西亚地区,农业的发展水平迅速提高,农产品已经可以保证上千人的需要,可以保证稳定的定居生活,人口居住密度也日益增大,人群居住已经从最初的村庄发展到早期小城镇的阶段。

早期城镇的发展集中在天然农业比较发达的地区。比如,杰里科位于约旦河附近,是早期天然农业的主要耕作地区,充足的水源和降雨使得这里成为人类最早定居的地方。农业是最重要的生

产部门,狩猎仍然占有重要地位。查塔·休於还是重要的手工业中心。在墓葬中发现的燧石和黑曜石武器、首饰和黑曜石镜是新石器时代最精致的产品,证明这个时期物质文明已经比较发达。

随着聚落规模的不断扩大,房屋的形制规模也不断变化,专门的宗教建筑和设施、城市防御设施开始出现。在杰里科,建造了防卫城墙。小型宗教建筑设施也相继出现。此外,当地居民还雕刻了与人同高的塑像和头像,这些塑像可能用于祖先崇拜。查塔·休於的城镇发展稍晚于杰里科,但其规模远大于杰里科,这里是新石器时期最发达的人类居住中心。

从经济发展和聚落规模布局来看,在这两个早期城镇遗址中,社会分化已经开始出现。在杰里科军事防御设施中,大规模的运输和建筑工程说明劳动力已成规模、有组织。在查塔·休於发现的规格标准统一的房屋建筑证明这里的管理权力可能比杰里科更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杰里科鼎盛时期的人口达到近 2 000 人,查塔·休於的人口则已达到 4 000 ~ 6 000 人,包括城市的统治阶层,城市中从事各种职业的手工业者、商人、小商贩等。但社会分化在这个时期也仅仅是刚刚开始,主要差异体现在社会分工上,在房屋居住、墓葬中并没有明显的等级分化的证据。而且这些早期聚落仍然十分分散,城镇人口仅占聚落人口中的少部分,聚落各自独立,周围是广阔的平原和森林,不利于交流与沟通。最早的城镇中心的贸易范围十分广阔,查塔·休於的贸易范围已远达地中海沿岸,但这些长途贸易是偶然的、不固定的,主要贸易对象仍仅限于周围的狩猎采集聚落,因此,无法对贸易对象区产生持久的影响。

在杰里科和查塔·休於发展的鼎盛时期,在两河流域上游地区,居民从小群体的、以采集和狩猎维持生计的、流动的生活状态向定居生活转变,形成早期聚落。早期聚落各自分散和孤立,主要集中在两河流域北部的峡谷中。这个时期,农业和畜牧业已经产生并迅速发展,同杰里科和查塔·休於一样,采集和狩猎在日常生

活中的地位仍然十分重要。公元前7千纪早期,在两河流域地区的北部,天然农业为主要生产部门,也出现了剩余产品和交换行为。

公元前7千纪中期,两河流域北部地区进入哈苏纳文化期。这个时期,社会开始出现私有化现象,印章可能是为了证明财富为村落所有,或为个人所有。^①但在各个遗址发现的当时的房屋建筑中,房屋形状大小没有差别。各个聚落有公共墓地,随葬品也没有明显差别,证明社会分化还不明显。

公元前7千纪末期,哈苏纳文化被萨麦拉文化代替。建筑风格发生重大变化,发现了封闭的围墙和壕沟,可能用于防御,进一步证明私有化现象出现。不同聚落的居民开始为争夺财富而发生战争,这是促进社会复杂化的一个主要因素。这个时期另外一个重大变化是灌溉农业的兴起,它扩大了人类可居住的地域范围,有利于定居人口摆脱天然农业的地域限制。在萨麦拉文化期的遗址中发现的农作物既有天然农业地区生长的谷物,也有需要灌溉的亚麻等作物。

在西亚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农业和畜牧业已经成为社会生产的主要部门,狩猎和采集显然还发挥着一定作用,商业贸易也已经成为社会生产的主要部门之一。在社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剩余产品出现,商业贸易中开始出现了奢侈品。在村落内部,由于农业、畜牧业生产的发展,出现了脱离农业和畜牧业的专门的手工业者和商人。这样的村落成为城镇出现和发展的基础,也是社会等级分化的前奏。在村落和城镇中开始出现了贫穷的劳动者、农民、手工业者和富裕的商人。社会复杂化现象已经开始呈现。从这个时期开始,两河流域下游地区聚落的发展速度逐渐超过北部地区,

^① 塞·劳埃德著,杨建华译:《美索不达米亚考古——从旧石器时代至波斯征服》,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58页。

南部平原上聚落的数量不断增加,规模超过北方聚落。这个进程大约发生在公元前 4000 年左右,即两河流域考古学上所称的欧贝德文化晚期和乌鲁克时代早期。在北方,查塔·休於和杰里科、哈拉夫等城镇衰落,没能像南方的早期聚落一样继续发展成为真正的城市和国家。

二、欧贝德时代和乌鲁克时代早期城市的兴起和发展

欧贝德位于乌尔附近,欧贝德文化以此遗址命名。欧贝德文化时期灌溉农业迅速发展。这里位于两河流域下游冲积平原,有大片湿地,在传统的狩猎和渔业基础上,欧贝德时期出现了更先进的生产生活方式,灌溉农业成为社会生产的主角。在欧贝德,发现了较成熟的建筑样式和防御体系,神庙建筑出现。此外,在北部已经使用石制甚至金属制工具。

欧贝德时期的居住形式以小型聚落为主,是由几个大型村落组成的聚落,其规模大于之前任何一个时期的村落。聚落依水源而建,规模不超过 10 万平方米。欧贝德时期的房屋面积远大于此前任何一个时期的建筑,后来在神庙建筑中延续下来。墓葬出现了砖造墓穴,有私人用品陪葬,陪葬品中没有明显的财富差别,但也不排除有单独的特权集团的墓葬所在地的可能性。神庙位于聚落中心。在埃利都遗址^①,考古发现的神庙建在平台上,后来逐渐建成多级塔庙。在埃利都,有许多神庙聚集在一起,说明有许多神被祭祀,每个神有自己单独的祭祀场所。从极其简陋的、面积不足 3 平方米的壁龛和祭坛到中央殿堂和侧廊的出现,欧贝德时期的神庙布局逐渐表现出宏大的气势。在高拉遗址的一座神庙里,发现了大量的按压式印鉴,说明神庙开始成为政治或行政中心。

神庙的主要人物为祭司,他应该同时也是政治和经济领袖。

^① 欧贝德时期最重要的遗址为埃利都,今名阿布·舍赫赖(Tell Abu Shahrain)。

神庙中心和祭司的出现证明在由村落组成的聚落中出现了地位较高的聚落中心,它可能是一个中心村落,也可能是各村落推举的中心,也可能是一个新村落。与原来的村落相比,新的聚落由内外平等、自主的村落形态发展为存在主从和不平等关系的聚落。中心聚落有政治、军事、文化和宗教中心的地位和作用,宗教建筑成为在精神上凝聚全社会的宗教中心,周围的普通聚落则失去平等、独立地位,与中心聚落形成半从属关系。欧贝德时期,以掠夺剩余产品为目的的战争出现,聚落中出现了防御体系。^①新石器时代末期青铜制造业的发展促进了武器制造业的发展,提高了军事实力,保证了国家和社会组织中军事职能的作用。

政治、经济、宗教和军事职能在聚落中出现;手工业和商业活动从农业和畜牧业中脱离,出现了专门的手工业者和商人,城市经济的雏形开始显现;聚落被农田包围,城市布局初具规模。这些都证明,城市开始出现。

公元前5千纪中后期,欧贝德时代结束,两河流域史前历史进入乌鲁克时代。在此之前,大约在公元前4500年左右,苏美尔人迁徙到两河流域冲积平原地区,城市化进程应是在苏美尔人到达前后开始的。居民成分的变化并没有影响两河流域地区社会演变的进程,从欧贝德时期到乌鲁克时期,房屋建筑样式、神庙格局、防御体系等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证明这个转变是和平过渡的。

乌鲁克时代早期的神庙周围开始出现附属性建筑^②,说明神庙功能进一步复杂化。社会中贫富分化现象更加明显。这个时期的定居聚落在社会演进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大约从公

^① 塞·劳埃德:《美索不达米亚考古——从旧石器时代至波斯征服》,第61页;哈·克劳福德:《苏美尔和苏美尔人》(H. Crawford, *Sumer and Sumerians*, New York, 1991),第48—49页。

^② 塞·劳埃德:《美索不达米亚考古——从旧石器时代至波斯征服》,第30—32页。

元前 3400 年开始,在整个两河流域南部地区,聚落规模开始扩大。在欧贝德时期形成的两级聚落逐渐被更加复杂的三级聚落或四级聚落取代,在这样的聚落里,主从关系、中心与边缘关系更加复杂。

三、乌鲁克时代早期国家的形成

大约在公元前 3200 年左右,古代两河流域地区进入乌鲁克时代晚期^①,城市产生之后的城市化进程与古代两河流域国家的形成基本同步进行。当时的乌鲁克城面积大约在 200 公顷,其人口来源主要是原来的城市居民和城市化的农村人口。在这个阶段的后半期,以捷姆迭特那塞为典型,古代两河流域国家正式形成。这个时期社会发展的主要标志是文字的产生并与印章一起用于国家管理,大型纪念性建筑出现,大型金属冶炼工场在国家生产中发挥重要作用,等等。

根据考古发现,最早的文字雏形出现在乌鲁克三期,在乌鲁克四期初期,文字应当已经出现,但考古发掘并没有发现有字泥板。捷姆迭特那塞时期,文字记录正式出现,在捷姆迭特那塞遗址发现了被遗弃不用的有字泥板。捷姆迭特那塞时期的古朴文字泥板主要记录日常生活中的物品、土地数量等。在一些纪念性建筑基址



早期古朴文字泥板 (Roaf, Michael, *Cultural Atlas of Mesopotamia and the Ancient Near East*)

^① 亦即乌鲁克遗址三期和四期。

面,还有很多散落的泥板。泥板上有最早的图画文字和印章,记录着物品管理和工人食物配给情况。乌鲁克四期末出土的有字泥板中有 90% 是收据和交易数量、财产数量的记录。^① 证明在乌鲁克发现的收据说明,在当时的社会里,没有收据的交易是不合法的,^②在乌鲁克四期已经出现法律规定的雏形,虽然完整的成文法律在一千年后才在两河流域地区出现。在捷姆迭特那塞出土的职业官衔表是最早的与物品清单、收据等无关的文字记录,它证明文字记录已经用于国家管理之中。职业官衔表的记载证明,在两河流域早期国家中有了社会等级、官僚等级、职业等级的划分,宗教祭司、长老在国家管理和社会决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文字记录方式和内容的变化证明了两河流域早期国家应当已经形成。几乎同时,在叙利亚的埃布拉和伊朗的苏撒,文字也出现了,但苏撒的文字很快被两河流域地区发明的楔形文字取代,同时国家形式也代替了苏撒本地起源的政治组织形式。这些都证明,文字是适应社会复杂化进程的需要而产生的,但文字的产生并非国家形成的单一标志。文字产生前,十分发达的神庙和宗教组织的存在也是国家出现的一个重要前提。

在早期国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各种权力机构相继出现。在城市中,最早出现的组织机构应是神庙。在乌鲁克发现的埃阿那神庙布局复杂,多级塔庙已经形成。它与乌鲁克发现的另外一座神庙——白庙在建筑格局上相同,但供奉不同的神,与发现的同时期其他神庙规模已有所区别,证明城市保护神观念已经形成,城市保护神凌驾于其他神之上,也证明了社会权力、社会等级在这个时期已经形成。

^① H. 萨格斯:《伟大的巴比伦》(Saggs, H., *The Greatness That Was Babylon*, London: Sidgwick & Jackson, 1988), 第 176 页。

^② H. 萨格斯:《伟大的巴比伦》,第 176 页。

神庙是古代两河流域乌鲁克时代晚期最重要的社会组织机构。首先,神庙应是一个集会场所,城市或聚落的居民在这里祭神、议事等。在神庙建筑中,存在着功能分区,大殿为祭祀神供奉神像之处,中心庭院两侧为神职人员活动的区域,包括祭司及其他辅助人员的住处、神厨、神井、储藏间等。其次,它是城市的管理中心,神庙人员同时是政治组织的管理人员,在捷姆迭特那塞的职业官衔表中,神庙人员占据重要职位。与早期国家政治组织有关的一系列证据也多在神庙中发现,如文字记录、印章、斜沿碗等。证明神庙的管理职能在早期两河流域国家中有重要作用。最后,神庙还是城市和更大区域的经济中心。神庙已经具有聚集产品的功能。^① 乌鲁克的埃阿那神庙遗址发现的大量印章、印鉴、早期古朴文字泥板等所反映的多是与地区间贸易、产品交易、货物储藏等有关的事务。神庙还是城市的商业中心。储藏库里收藏着城市的各种产品,包括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和贸易商品,神庙外的庭院是城市的市场。此外,手工业中心也在神庙里,在埃阿那神庙发现了制作陶器和金属器的手工业作坊。其中金属器作坊面积很大,所能制造的金属器数量显然并非私人所有,可以断定,这是一个由国家 and 政治实体控制的工场。^②

神庙还是乌鲁克时代对外贸易的中心。在古代社会,贸易的含义不仅是长途或短途的商品贸易,还包括纳贡和掠夺。古代两

^① J. N. 珀斯盖特:《早期两河流域地区:初史时代的社会和经济》(J. Nicolas Postgate, *Early Mesopotamia: Society and Economy at the Dawn of Histo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第 25 页。

^② 汉斯·尼森:《古代近东的早期历史,公元前 9000—2000 年》(Hans J. Nissen,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 9000—2000 B. C.*,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第 92 页。

河流域地区的贸易网络^①在国家产生前已经形成,它与伊朗高原东北部、西南部,海湾地区,印度河流域,两河流域中上游地区,安那托利亚地区的贸易网络在公元前7千纪时就已经出现。乌鲁克时代晚期,以两河流域南端的乌鲁克等城市为中心,通过经济、贸易、军事和文化扩张等手段,在古代西亚地区建立了一个不断扩张的“世界体系”。^②

贸易为国家的产生准备了必要的物质基础,不仅提供生活必需品,更主要的是贸易中的奢侈品,如宝石、黑石、珍贵木材等数量的不断增加间接地印证了两河流域地区等级分化、统治阶级产生以及社会财富积累的过程。乌鲁克扩张的主要目的是寻找原材料,如金属、木材、石料和油料。乌鲁克人沿贸易路线建立城市化的货栈,或者由当地统治者纳贡、军事征服和掠夺,更经常采用的是与当地居民签署互惠协议,由当地提供劳动力对原材料进行加工或粗加工。这些行为导致中央权力和复杂的政治机构的确立,并以此确立了国家外交、经济、政治基础,确立了社会经济等级。扩张反过来对乌鲁克本土的社会政治产生影响,比如神庙建筑和权力由于财富的增加而愈加扩展。日益增强的中央权力,主要表现在农业剩余产品由神庙负责进行再分配。从文字记录、神庙建筑、手工业作坊、对外贸易等几方面的诸多证据,我们可以大致复原乌鲁克时代晚期社会的政治经济面貌。

农业和畜牧业已经成为社会的主要生产部门,依靠已经十分发达的水利灌溉设施,农业生产收入稳定。手工业生产也已经从

^① 近年来,一些学者利用社会学的“世界体系”理论解释乌鲁克扩张,提出了乌鲁克世界体系的概念。“世界体系”的概念是20世纪70年代由美国社会学家E.沃勒斯坦提出的针对当代社会问题的一套理论,在古代文明研究领域,一些学者亦利用它来解释史前时代国家形成以前的地区范围内的“世界体系”。

^② M.罗斯曼主编:《两河流域乌鲁克及其邻近地区:国家形成时期的交叉文化影响》(Mitchell S. Rothman ed., *Uruk Mesopotamia & Its Neighbors Cross - Cultural Interactions in the Ear of State Formation*, School of Amer Research Press, 2001)。

农业和畜牧业生产中脱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而且,在手工业生产中,金属冶炼术产生,使得金属冶炼成为继陶器制造之后另外一个主要的手工业生产部门。此外,长途贸易已经十分发达,在乌鲁克时代晚期遗址中,来自各地的物品随处可见。

社会中出现了政治管理机构和社会等级的划分。在各个城市中,显然都有首领。在捷姆迭特那塞发现的一块太阳石刻碑^①上,有两人猎狮的场面,他们穿着打扮一样,蓄须、留发髻、戴冠、穿长褶裙,一个在弯弓射箭,一个在投掷长矛,它主要表现一个孔武有力的英雄使用不同武器的形象。在这个时期的一些印章中,同样打扮的人也经常出现,或主持喂养圣牛仪式,或正在手刃敌人,描绘了一个拥有宗教和军事权力的领袖形象。统治者是城市保护神和人民之间的媒介,他也是城市处于危机时刻的保护者。统治者因此具有重要的宗教地位,在乌鲁克发现的祭神瓶画面上,一个向神贡献的裸体祭司的后面还有一个人,但可惜瓶子在这里缺失,从旁边一个有可能是仆人的人手捧带穗的腰带正在献给某人的场面看,几乎可以肯定,缺失部分描绘的一定是主祭者,即统治者。在其他艺术作品中,统治者的形象为穿着裙子、戴着盘成麻花形状的冠,他的职责是建筑和维护神庙。在乌鲁克时代晚期的音节表中出现了塞姆语“šarru”一词^②,这个词的意思是“王”,有可能是对这个首领的称呼。

乌鲁克晚期,国家官僚机构的雏形也开始出现。在乌鲁克已经出现了高级官吏、普通官吏和祭司^③。他们控制着农业、畜牧

① 哈·克劳福德:《苏美尔和苏美尔人》,第 21 页。

② 哈·克劳福德:《苏美尔和苏美尔人》,第 218 页。

③ 尼森:《古代近东的早期历史,公元前 9000—2000 年》,第 80—81 页;贾可诺夫:《古代西亚君主国家的主要经济方式》,载《古代帝国及其经济》(I. M. Diakonoff, “Main Features of the Economy in the Monarchies of Ancient Western Asia”, in *the Ancient Empires and the Economy*, Paris, 1969), 第 18 页。

业、手工业和贸易,负责建筑和维护神庙,组织宗教庆典和监督祭祀。此外,聚落防御体系的存在证明各聚落存在军事部门,有军事首领负责指挥战争。这些管理者往往拥有高额财富、占有多数的分配份额。此外,在部分墓葬中还发现了大量陪葬的奢侈品,证明当时存在着一个拥有巨额财富的阶层。

劳动力管理显然是国家经济统治中的一个主要内容,在乌鲁克晚期,劳动力参与水利设施的修建和维护、参与修建神庙和城墙、参与建造大型建筑物。一些学者认为,在这个时期,已经出现强制劳动,即出现了奴隶劳动。^①

在乌鲁克时代晚期,古代两河流域已经进入等级社会,^②出现了以统治者为首的贵族等级,他们是各级官员和管理者,拥有土地、财富、房屋等经济上的特权。在贵族等级之下是平民等级,他们应是从事劳动的农民、手工业者、商人等,有服劳役的义务。奴隶等级可能尚未正式形成,但强制劳动已经出现,而且在战争中已经出现战俘,这预示着已经有奴隶身份的人存在。

在国家的统一管理 and 组织下,社会生产更加组织化、产业化和社会化,行业内部分工更加细致。社会化有组织的劳动表明再分配体制已经存在。从乌鲁克晚期时代初期就开始大量出现的斜沿碗^③,在乌鲁克晚期时代末期已经可以用模具成批制造出形制相同的碗。这些碗数量众多,占所发现的陶器总数的 3/4。有理由

① 尼森:《古代近东的早期历史,公元前9000—2000年》,第95页。

② 关于古代两河流域社会等级的形成,参见刘健:《古代两河流域社会等级制度的形成和特点》,载施治生、徐建新主编:《古代国家的等级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07—125页。

③ 尼森:《古代近东的早期历史,公元前9000—2000年》,第83—84页。斜沿碗的使用从宗教仪式延伸到广泛的食盐贸易。这些碗是大批量制造的,并且用过即弃。它可能是神庙用于日常分配的量具,或者是用于供奉的器具。新近的观点认为这是用于祭祀地府的盛器,从地里取土制成简单的容器,装上丰收的粮食,再还给大地以保证土地的丰收,这可以解释其质地为何不硬及大批量生产和在神庙发现等特点。